

一个 95 岁老南海人与西南联大那些事

○李 华 刘永亮

2017年11月1日，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，90余名均龄超95岁的校友齐聚，共忆艰苦岁月，共叙联大精神。一时间，这所被称为“战火中的教育奇迹”的大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就在佛山，有一位95岁的老南海人霍焕然老先生，正是西南联大最后一届毕业生。2016年，他向清华大学档案馆捐出了自己的西南联合大学入学通知书、毕业证书、学年注册表、闻一多先生亲刻印章。11月6日，记者走进霍焕然先生的家，聆听他的这段西南联大往事，希望以联大精神与读者共勉。

在他10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，光线有些昏暗，他沏上茶待客，将包得整整齐齐



霍焕然学长参加西南联大纪念活动时发言

的老照片和证书一一展开，揭开一段尘封的记忆。

他拿出毕业证书复印件，从复印件细密的折痕中可看出，这份证书曾多次展开、折起。黑白色的复印件上用繁体字写着：“学生霍焕然系广东省南海县人，现年二十四岁，在本校法商学院商学系修业期满，成绩及格，予以毕业。依照学位授予法第三条之规定，授予商学士学位，此证。”而署名处则写着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梅贻琦、傅斯年、张伯苓。

这张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（1946年）的毕业证书复印件，牵扯出了一段70多年前关于西南联大的时代记忆。

2016年5月8日，在清华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校庆大会上，他将自己珍藏了70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入学通知书、毕业证书、学年注册表、闻一多先生印章，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档案馆。

西南联大最后一届毕业生

午后三点，正好到约定的时间，在一栋旧楼里，霍焕然已经等在四楼的楼梯的窗口向外张望。见到他时，他微微佝偻着背，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袖衬衣，衬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，他的头发梳成油光发亮的大背头，颇有老派作风。



霍焕然的西南联大毕业证书

他脸上的褶皱堆出了满满的笑容，一排牙齿整整齐齐。他一开口，声音洪亮清晰，难以置信，这是一个95岁的老人。

“这栋楼我住了三四十年了，现在还每天爬上爬下五六次。”

在他的客厅里，滚烫的茶水冒着氤氲的白气，故事从他的毕业证复印件上的梅贻琦、傅斯年、张伯苓三个名字说起。

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校长、傅斯年是北京大学校长、张伯苓是南开大学校长。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，组成“长沙临时大学”，同年10月25日开学。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，改称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，5月4日开始上课，设立文、理、法商、工、师范5个院26个系。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，三校分别迁回北京、天津复校。

虽然在滇只有短短的8年，但西南联大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。8年时间里，西南联大约有学生四千人，毕业生近两千名。但西南联大却出了171个中国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，其中有杨振宁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；赵九

章、邓稼先等8人获得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

毕业证书的落款时间正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（1946年）。“证书上还写明了，因为抗战胜利，西南联大解体，三校北迁回原址，所以提前毕业。正常应该是7月份毕业的。”霍焕然指着毕业证书上模糊的印刷字迹说。

关于这段历史，易社强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一书中有些记载：“根据学术特长、师资和个人爱好，学生选择返回的学校。1946年5月2日，最后一场考试结束，北迁就开始了。”而刚好完成四年学业的霍焕然，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，成为西南联大最后一届毕业生。

漫漫求学路

“入学的时候17人，同我一起毕业的我们系的只有10人，七个男生，三个女生。”霍焕然指着一张黑白毕业照说，“当时毕业时，因为学校要回迁，秩序很乱，同学各奔东西，这么多年再无联系。大家都是耄耋之年了，估计大部分都驾鹤西去了。”

霍焕然于1922年生于广东南海县，他的父亲在广西做航运，母亲生了16胎，只有6胎养大成人，“我前面有个哥哥，我是第九胎，小时候身体不算好，家里费了好大努力才把我养活。”霍焕然说，他在三四岁时，就动了三四次手术，切掉了半个肺，拿掉了两根肋骨。

“我直到五年级之前都没上过学堂，家里请了先生教古文、诗经、书法和算术。先生拿着藤鞭在我头顶，读错了就一鞭子打下来，很严厉。”霍焕然回忆道。他先后在华英中学和南海一中（今

□ 联大春秋

佛山一中)读初中,高中就读于澳门培正中学。

1938年1月,为逃避战乱,培正学校由广州迁澳,是为澳门培正中学之始,培正于战乱之中而弦歌不辍。“培正中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留洋的,学校除了国文课是用中文的,其他都是英语,我当时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讲。”霍焕然在澳门培正中学读书时,为了攻破语言难关,“晚上就在宿舍被子一蒙头,在被窝打个手电(筒)背英语字典,因为怕查房的宿管发现。”

培正中学毕业后,认为“读书是一

条好出路”的霍焕然,投考了中央政治学校、岭南学院、西南联大几所大学,“当时怕没书读,就多考了几家,结果都考上了。”当时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广西工作有朋友可投靠,于是就选择了西南联大。霍焕然认为,他能顺利考取西南联大,可能跟他在培正中学接受的英文教育有关。

霍焕然说,选择法商学院则与广东人的“精明”有关。当时大批学生选择法商学院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找工作。战时,银行、企业和政府机构都争相录用经济人才,证书上带有“经济”字眼的学生没有理由担心毕业后会挨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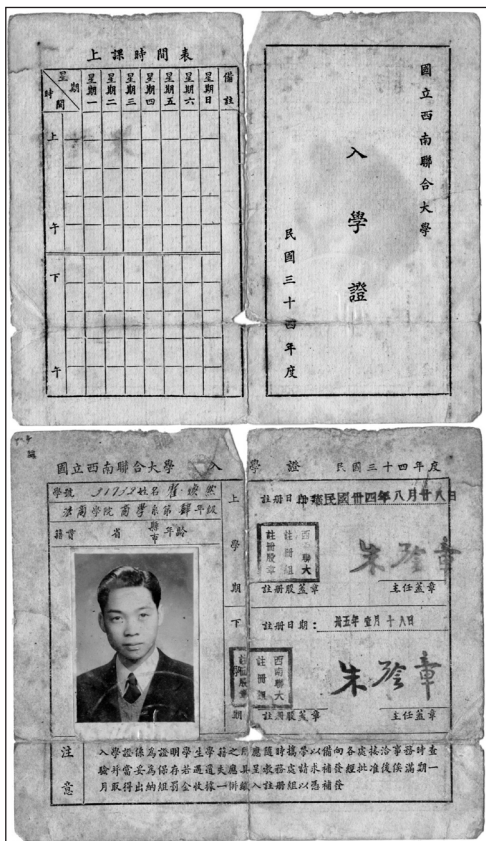
1942年,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,从澳门到昆明是一段艰辛之旅。“当时从澳门,经过中山、肇庆四会,转到梧州,再到昆明。走下停下,都忘了走了多久。路上就我一个人,有些地方不会走,就请当地人带路。”最后终于到了西南联大,这个被霍焕然称为“被教授烟斗喷四年,你就能升仙”的地方。

四年大学辛苦备尝

“那时读书的条件比现在差十倍、百倍都不止。”霍焕然说,那时学生校舍是茅草屋,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。而上课的课室也一样简陋,“教室哪里有桌子?就几条板凳,有黑板和讲桌”。

比霍焕然高几届毕业的杨振宁曾回忆过:“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,下雨的时候,叮当之声不停。地面是泥土压成,几年之后,满是泥垢;窗户没有玻璃,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,否则就会被吹掉……”

即使学习和生活环境糟糕,但精神世



霍焕然的西南联大入学证(正反面)

界却很丰富。当时，西南联大学者云集，群贤毕至，荟萃了闻名于世的许多方家、教授，比如冯友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陈岱孙、费孝通、吴晗等等，被历史学家称为“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的时代最好的大学”，享誉“中国大后方学术文化中心”之美名。

据资料记载，当时联大实行学分制，修满136个学分方可毕业。法商学院，必修课为50个学分，选修课为86个学分。

“有些教授的课太难，及格率很低，大多数广东的学生就不会选，因为联大是没有补考制的，一旦不合格，对不起，你就要离开学校。”霍焕然说。

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，每学年开设的课程贴满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，没人能够将所有想选的课都列入自己的日程表，因此旁听变得司空见惯。比如钱穆的“中国通史”选课者只有数十人，旁听者多达数百人，以致座无虚席，后来者只能站在门窗前听讲。霍焕然也常常挤在课室里，听冯友兰、闻一多等名教授的讲座。

联大教授传授的是自家的研究成果，不是人云亦云、易于理解的“大路货”。在霍焕然的印象中，学生没有教材，老师在黑板上列一堆书单，课后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找来看。“当时老师对我们讲：‘我就给你们一把钥匙，进去能拿到什么宝藏就靠你们自己了。’”这句话刻在霍焕然的脑海里已经70多年了。

学生、教授各有“副业”

史料记载，1942到1945年间，昆明物价指数是重庆的两到三倍。虽然那时候教育部命令所有大学不得征收沦陷区学生的

学费，联大学生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，教育部还每个月给学生发放贷金。但贷金的增长比不上日益走高的物价，1945年政府贷金还不到伙食费的一半，学生只好“三月不知肉味”了。

“大部分同学都需要兼职，有的不止做一份，同时做几份。”霍焕然也不例外，“当时很搞笑的是，有个哲学系的教授白天给我们上课，晚上我就到他们家做家教，教他两个子女英文和数学。”

兼职所得只为了换取更多的食物，霍焕然说那时候他主要的食物是黑馒头，“广东人要吃好几个才够，北方同学一两个就够了”。黑馒头究竟是怎样的已不得而知，不过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记载过一种食物：“一种截然不同的‘八宝饭’成了战时学生的主食。‘八宝饭’这个词颇具有反讽意味，主要是劣质的稻谷，红色的，经常是发霉的，还能看到糠谷、草籽、沙粒和小石子，有时候还有老鼠屎，就像有些学生说的，有‘动物、植物和矿物’……”

学生生活窘迫，教授也不例外。从一些史料中得知，那时为补贴开支，西南联



闻一多为霍焕然刻的印章

□ 联大春秋

大教授闻一多挂牌刻章、朱自清熬夜写稿、吴晗割爱卖书、梅贻琦夫人卖糕是常事。陈明远的《何以为生》中写道：从1944年到1946年7月三年间，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方印。仅这个数目而言，已接近每天刻一方；何况，还有不少印章没有留在印谱上。

霍焕然捐给清华大学档案馆的物品中就有一枚闻一多的印章。说起这个印章的来历，时代久远，霍焕然已没有太多细节描述，“当时去听闻一多先生的课，知道他平时帮人刻章，我就请他帮我刻了一枚印章”。因为印章已经捐赠出去，无法看到印章实物，“那是一枚石印，上面写着霍焕然，印章上还留了‘一多字’。”

拖住时代的尾巴

“很少同学能完成四年的学业，有些读着读着就去山区教书了，有些投笔从戎去抗日了。在联大的广东人不多，不超过20人，但大多数都能读完书。”霍焕然说，毕业后，他收到了6份聘书，最终他到了上海在金城银行工作，直至解放后才被调回广东。

在反右运动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霍焕然被下放到恩平农村10年。1980年他回到佛山，在他原来读书的华英中学（现佛山一中）总务处工作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为推进经济建设，国家恢复注册会计师考试，60多岁的霍焕然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，他成为佛山市第一批注册会计师。此后，他还开办了佛山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，在之后多年里，他一直致力于为佛山培养会计师，直

到1989年3月，佛山市教育委员会给他发了退休证。

退休至今他还闲不下来，每天白天转两趟公交车到他学生的单位里上班。闲暇在家时，他通过一台老式电视机看“新闻早班车”，翻阅《人民日报》，用这些“窗口”了解外面的世界巨变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学打字，学会了用微信。

他活过了近一个世纪，如今一人独居在近2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。他说“虽然跟不上时代，但时代的尾巴还是要拖住的”。

他将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西南联合大学入学通知书、毕业证书、学年注册表、闻一多先生印章，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档案馆，他说：“人生来世走一遭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”

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，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弦诵在山城，情弥切。

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须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复神京，还燕碣。

采访结束时，霍焕然用粤语一字一句清晰地朗诵着西南联大校歌《满江红》，傍晚昏暗的屋子中，他声音苍老却有力，那一刻他神采奕奕，并不清澈的眼睛仍然闪着光，仿佛他的眼睛里正在播放一组镜头，迁徙、战火、求学、传道、解惑……

（原载《珠江时报》2017年11月7日）